

BAIHUA PROSE SERIES

BH  
百花散文书系

# 韩非散文选集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主编 徐柏容 郑法清

# 韩非散文选集

萧华荣 选注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韩非散文选集

萧华荣 选注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三河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7 1/2 插页 4 字数 156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

ISBN 7-5306-2396-6/1·2138

定价:11.50元

## 内 容 提 要

韩非是先秦著名的散文大家，他的成就标志着先秦散文已经走向了成熟。韩非的散文笔锋犀利冷峻，淋漓尽致地透视出人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将其暴露于光照之下；韩非的散文长于取象，广作譬喻，以一个个活泼生动、蕴含着丰富深邃哲理的小故事，将人们引入诱人的艺术天地，领略到多彩多姿的风光。韩非敢于领导标新，独辟蹊径，开创了多种散文体式，并能熟练驾驭，对后世散文创作影响极大。

本书精选韩非散文中最具文学性的部分，加以题解、注释，并对其散文的艺术成就、特色加以分析。这些流传两千多年、具有无穷魅力的艺术精品，必将给读者带来品味不尽的美的享受。

## 编辑例言

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它同诗歌一样，是中国古代文学最重要、最有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璀璨宏丽的文化宝库。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继承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从而促进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和提高，并供广大读者借鉴、欣赏，特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散文丛书”，作为“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散文文体范围，代有嬗变，古今不同。本丛书所选，皆以文学性散文为主。入选作家，上始于先秦，下迄于清末。各家作品均单独成册。各书篇目排次，原则上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了解作者散文创作之发展与演变。

为了使读者全面了解入选的作家与作品，每书均有万字左右的序言，除简介作者生平、文学活动概况及时代与文学背景外，着重结合选入作品，评述其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和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等，作为阅读、欣赏、评价具体文章并进而研究作者及其散文的初阶。

为适应不同文化程度读者的需要，选入的各篇文章之后，一律附加简明题解和注释，简解题意、背景，疏释较难理解的语词、典故、职官、器物及地名、引文等。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够编得有自己的特色，与一般选本有所不同，能更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为此而努力，也希望能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帮助。

百花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韩非和他的散文	1
五 蠹	18
孤 愤	42
说 难	51
定 法	60
难 势	67
爱 臣	75
和 氏	79
观 行	84
功 名	87
大 体	91
问 辩	96
十 过	100
喻老(节选)	126
说林上(节选)	132
说林下(节选)	144

内储说上——七术(节选).....	154
内储说下——六微(节选).....	163
外储说左上(节选).....	172
外储说左下(节选).....	184
外储说右上(节选).....	192
外储说右下(节选).....	203
难一(节选).....	209
难二(节选).....	217
难三(节选).....	224
难四(节选).....	231



## 韩非和他的散文

知渊中之鱼者不祥。

——《韩非子·说林上》

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

——《韩非子·内储说下》

—

韩非的生活命运是一个悲剧，韩非学说的历史命运是一个悲剧，韩非作品的文学史命运也是一个悲剧。

《韩非子·说林上》曾经引用过一句古老的谚语：“知渊中之鱼者不祥。”根据《列子·说符》篇的征引，这句谚语的完整表述应是：“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匿者有殃。”眼光过分敏锐，能够看得清深水中的鱼儿，那是不吉利的；头脑过分聪明，能够猜得透他人的隐私，那是要遭殃的。这个古老的戒条真是不幸而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韩非整个悲剧命运的始因与胚芽。

韩非（约公元前 280—前 233 年）生活于战国末期，七雄争鼎逐鹿的斗争已接近尾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即将诞生。在他卒后仅十二年，秦始皇便统一了中国。韩非是韩国的“诸公子”，即宗室疏属。韩国在战国七雄

中比较弱小，又西邻强秦，成为秦东向问鼎首当其冲的猎物。韩非死后的第三年，韩国便被秦吞食了。

韩非口吃，而善著书。他曾师事著名的思想家荀况，与后来成为秦丞相的炙手可热的李斯是同学。韩非想以学得的“帝王之术”报效祖国，便多次上书韩王，建议实行法治，富国强兵。但昏聩的韩王不能采纳，却不料“墙里开花墙外香”，得到异国君主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的激赏。韩非的文章句句拨动了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的心弦，决心把韩非弄到手，便加紧进攻韩国，迫使韩王派遣韩非以使者身分居留秦国。然而，“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秦王对韩非尚未及任用，却招来那位同窗的嫉视。李斯深知韩非的才华高于自己，便罗织罪名，抓住韩非曾上书秦王“存韩”的小辫子，说韩非毕竟心向韩国，忠于韩王，终非掌中之物，说不定还是韩国的奸细呢，不如杀之，以绝后患。秦王听信谗言，把韩非关进大牢，李斯趁机下了毒手。一代才人与思想家，竟断送于自己的聪明！

韩非有一篇千古奇文《说难》，对君主的种种猜忌心理和“说君如说虎”的凶险，做了鞭辟入里、令人信服的条分缕析，真可谓“察见渊鱼”，而他自己却不免杀身之祸。司马迁很同情他的这种悲剧，慨叹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秦王政是一位雄猜的君主，李斯是一位阴鸷的能臣，韩非本人又处于“韩诸公子”的可疑地位，对周旋于这种三角关系中的艰危情状，韩非原是洞若观火并多次论及的。但他终究是知之而不能行之的一介书生，而不是老谋深算游刃有馀的政治里手，最终死于赏识过自己的君主和推荐过自己的同学手中，难道这不是一个

聪明自误的苦涩的人生悲剧？

所幸他的著作留传下来，被后人辑为《韩非子》一书，共五十五篇，其中个别篇章可能出于其后学之手，而绝大部分是他本人的手笔。他的学说就保存在这些著作中。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学说的核心便是法、术、势并用。法是公之于众的法令，术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势是君主赖以威慑臣民的势位。其中最经常有效的手段是重赏严刑，这是君主手中的“二柄”和双刃刀。赏罚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农战。重农以富国，重战以强兵，富国强兵以统一天下。因此，凡是有碍或有害于农战的，诸如科学、艺术、道德、文章、儒生、隐逸、游侠、辩士等等，一切好看的徽号与好听的名声，统统都在疏远和弃绝之列。而上述一切，都建立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他认为趋利远害是人的天性，可资利用。他用无情的眼光看待阴暗的人心，赤裸裸地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争斗、倾轧与残害，甚至撕下夫妻之爱、父子之亲的温情面纱。他对那些争权夺利的统治者的卑劣情欲与恶行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他本欲为建立历史上第一个新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集锦方略，但他显得太聪明，太敏感，太“察见渊鱼”了，因而赢得“刻薄伤化”、“坏人心术”的千古恶谥，又铸就了身后的悲剧。

汉代以后，当标榜仁义道德的儒学最终夺得了思想上的王冠，韩非提供的统治术虽为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和践行，却又阳儒阴法，反过来斥责韩非“惨礻少恩”。宋代理学兴起后，韩非之学更被径直斥为异端。韩非在《说难》中讲过，君主对有些策士常常“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不料韩非也正遭到这种命运，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这种悲剧也殃及他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韩非有文才，他的文章虽立意在说理，指归于政治，却处处闪烁着文学的光华。先秦诸子之作多富有文学性，孟轲、庄周、韩非尤称翘楚。三家风格不同，成就各异。韩非散文在有些方面，如文笔的犀利、譬况的繁富、结构的谨严、体裁的多样，有超越其它二家之势。古代的士大夫好用孟轲的“浩然正气”以自励，用庄周的“游于方外”以自高，而以韩非为急功近利、坏人心术。所以，推崇孟轲文章者不胜枚举，推崇庄周文章者多如过江之鲫，推崇韩非文章者则寥若晨星，仿佛推重韩非的文章就会显得心术不端，故连同其艺术性也一并讳言。这种情况，唯有在明代，特别在晚明是个例外，那时思想比较解放，重视文章技法的探讨，评点之风盛行，韩非散文的艺术技巧受到空前的重视与爱好。“明世诸儒嗜是书者，特艳乎文丽，以借作文之资”，甚至“珍为帐中秘也，靡不家习而户尊之”（见松皋园《韩非子纂闻》）。当时一些有名的文士墨客，如杨慎、王世贞、茅坤、孙月峰、凌濛初等，都曾为各种《韩非子》刊本作序写跋，评鹭批点，给予高度评价。如王世贞赞其“峭而深，奇而破的”（《合刻管子韩非子序》），张鼎文美其“绝有气力光焰”（《校刻韩非子序》），王道焜说“屈原怨而哀，韩非怨而愤，马迁怨而悲”（《重刻韩非子序》），把他与屈原、司马迁相提并论，把《韩非子》与《离骚》、《史记》等量齐观。清代以后，对《韩非子》文学性的系统研究又比较沉寂。直至今日，对韩非散文的评价也似乎未提到应有的高度。

本文以下所论，侧重于韩非在文学上的独到成就，而与先秦诸子所同者，则尽量从略。

## 二

历来评韩非散文的总体风格，为“峻切”，为“犀利”，为“尖刻”，为“峭而深，奇而破的”，而对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则语焉不详。其实，秘密首先还是在于他那能够“察见渊鱼”的无幽不烛、穷极心曲的明敏眼光，使他能够“切事情，明是非”（司马迁语），“切究情状，穷极事类物态”（吴汝纶语）。

说到“察见渊鱼”，我们不禁想起庄周的一则故事。庄周有次与惠施一起来到濠水的一座桥上，他说：“瞧那些鱼儿在水中从容游荡，是何等地快乐呀！”惠施问：“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庄周答：“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看来他也是能够“察见渊鱼”的。不过，他在鱼那里看到的是逍遥，是自由；而韩非看到的却是秘藏在心底的隐私、策划于暗室的阴谋。庄周要与“鱼”化为一体，泯没物我的分别，投入自然的怀抱；韩非则与“鱼”判然为二，处于对立的地位，参与人世的事业。这是道家与法家之别、出世与入世之别。正是从此点出发，《庄子》与《韩非子》的艺术风格也分道而扬镳，一个上天入地，梦蝶化鱼，云谲波诡，表现为浪漫主义；一个则执著尘世，察微烛幽，冷峻切实，表现为现实主义。

但仅有“察见渊鱼”的眼光还不够，还要有揭示幽微的勇气。作为一名法家，韩非对于自己“惨礲少恩”的法治学说，对于政治斗争中的种种卑污、奸诈、勃谿、残杀等“人性恶”的揭露，认为是正当的，理直气壮的，并不存在什么“刻薄”与否的问题，因此他也就凭心而论，无所顾忌。我们可以《五蠹》为例，这是他的代表作，全面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

这里仅摘几句断语：

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

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

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这就是所谓“斩绝嵘刻”之文。其观点正确与否姑置不论，冷峻犀利、无所顾忌的文风则显然可见。

韩非散文的“刻深”还表现在：他能够纤洪毕至地剖析人们秘藏于心的微妙念头，特别是那些卑污的恶念，把它们拉到光天化日下示众。这在《说难》中表现得尤为集中，因为《说难》原本就是教示策士们如何“知所说(者)之心”的。文章首先分析君主们有的“为名”，有的“为利”，有的“阴为利而阳为名”等心理类型，接着历数了十几种进说不当导致“身危”的情况，然后又从正面论述了如何迎合君主骄傲与虚荣之心进行游说，也达十几条之多。分析得细密中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文章宣扬不择手段、曲意逢迎，虽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在今天看来终究是不足为训的；但在客观上，却无疑把当时最高统治者那种自负、虚伪、奸诈、残忍、喜怒无常、表里不一等险恶的心理活动暴露得淋漓尽致、阴森可怖，以至千载之下的我们读来，犹不觉毛发悚然！

韩非十分善于描绘最高统治集团那种极端自私、相互算计的人际关系，有时简直是诛心之论，甚至令人觉得有欠

“厚道”。如《备内》：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觐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因为要提防臣子的利用，所以连老婆孩子都不能相信，所以要“备内”，所以除自己以外世上无可相信者。封建的权力是一种多么腐蚀人的东西！古时帝王自称“孤家”，自称“寡人”，这段话大约是最好的注脚。更有甚者：

故與人(车匠)成輿(指官车)，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輿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

韩非的眼光未免过于无情，语言未免过于尖刻，但却合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人际关系的本质真实。翻开“二十四史”的帝王世家，子弑父、弟弑兄的闹剧不是屡见不鲜吗？

我们读韩非的散文，常觉得他如一个断狱的老吏、捉刀笔的师爷、握手术刀的外科医生，冷静，严峻，客观，不动声色，甚至冷峻到感情冰结的程度，但一旦讲到法术之士孤特无援、被刑就戮的情景，便禁不住兔死狐悲，把紧闭的感情闸门打开一个口子。如《孤愤》、《和氏》二篇，便是所谓“怨而愤”的文章。但从总的倾向来看，韩非散文的艺术风格毕竟以冷峻刻深为主，这是他独有的。他那“人心惟危”的露骨揭示与描绘，不仅为主“性善”的孟轲所无，为主“泯是非”的庄

周所无，在整个封建后世亦所罕见，可谓千古绝调。

### 三

本文篇首还摘引了韩非的另一句话：“古之人难正言，故托之于鱼。”这就是所谓譬喻、寄托、寓言问题。

先秦哲人好用具象思维，说理而不脱离具体形象，正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也。”“比兴”、“取象”就是譬喻，而譬喻是有效地进行说理的需要。据说魏惠王曾对惠施说：希望你“言事则直言”，不要譬喻。惠施回答：如果有人问“弹”（弹棉花的弓）是什么样子，告诉他“弹之状如弹”，他就会不知所云；告诉他“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他就很容易明白。所以惠施总结道：“说者固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说苑·善说》）在当时人看来，以常见易明的事物喻说陌生难懂的事物或概念，才不至于陷入“以弹说弹”的困境。韩非所说的“难正言，故托之于鱼”，用心也在于此。譬喻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个别的形象之物为比，即现在所说的“打比方”；二是以有一定情节的故事来譬况、喻说、寄托，庄周称之为“寓言”，并说自己的作品中“寓言十九”（十分之九）。他所说的“寓言”，与现在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寓言”内容不尽一致。根据王先谦的注解，是“意在于此，而寄于彼”的“寄寓之言”，比现在所谓“寓言”范围宽泛。这两种譬喻方式，韩非的作品中都大量运用。

“深于取象”、广作譬况，既是先秦诸子之文的共同特点，自非韩非所独具。但是，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备论先秦诸子，独于韩非评为“著博喻之富”，说明他在这方面尤为引人注目。当时文章善于引譬连类的，莫过于《庄子》与



《韩非子》，而后者更多于前者。这就使其文章富于文学性，富有文采，有花叶映发、枝叶扶疏之感。明代人说的“艳其文丽”，大约就着眼于此。但作为韩非本人，他真是“夙愿何曾形色笑”！如前所述，他唯重农战，反对文学等不急之物。他在《外储说·左上》中曾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有个楚国人卖珠，用“木兰之楛”盛着，外面还“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装饰得眼花缭乱，美不胜收，喧宾夺主，致使买主“买其楛而还其珠”。这个故事意在提醒人主对那些华藻的辩说，不要“览其文而忘其用”，不要“以文害用”。不料他本人的那些阐发“实用”的文章，为了使人爱读能懂，竟也缀以多得令人目眩的譬喻的“玫瑰”、“翡翠”，这其实是文学的胜利，艺术的胜利！这位反对讲究文采的实用主义者，竟被后人评为“艳”，评为“丽”，恐怕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也许这也未必不是他的一个小小悲剧！

在《韩非子》一书中，完全不打比方的文章不是没有，然而极少。他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往往要打一连串的比方，甚至比方中套有比方。有的文章以比喻开头，生发全篇；有的以比喻结尾，收束全文；有的通篇都围绕着某个比喻，虚实映衬。他的比喻不仅多，而且巧妙贴切，有时令人忍俊不禁，会心而笑。但善打比方并不是《韩非子》最突出的特点，《荀子·劝学》篇的比喻更为繁多，几乎占全篇的一半。《韩非子》中带有寓意性、托喻性的历史故事、民间传闻和寓言之多，才是他真正度越诸子之处。

韩非常常直接用故事、寓言解释、譬况某种观点，这主要见于以下三篇：一是《十过》，用十个历史故事分别说明他认为君主易犯的十种过错；二是《喻老》，用故事喻说《老子》